

子》的被称引情况,认为刘向之前没有一个 18 篇的原本。此外,可参宫长为《〈诗·大雅·公刘篇〉疏证》(《王集》)、王乐文《〈士丧礼〉和〈既夕礼〉所记名物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赵生群《〈左传〉疑义新探》(《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三辑)、刘光胜《由〈曾子〉十篇看〈性自命出〉的成书及理路——兼谈宋儒对先秦儒学的误读》(《史林》第 2 期)、曹建墩《据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校读〈大戴礼记〉一则》(《中原文物》第 1 期)、宋华强《由楚简“北子”、“北宗”说到甲骨文“丁宗”、“啻宗”》(《简帛》第四辑)、周宏伟《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北大史学》第 1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古代文明》第 3 期)、李振宏《“禅让说”思潮何以在战国时代勃兴——兼及中国原始民主思想之盛衰》(《学术月刊》第 12 期)、许景昭《禅让、世袭与革命:战国诸子之古代帝王更替观——与出土文献综合比较述论》(《诸子学刊》第 2 集)等。

两周考古。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集》)认为,周原遗址凤雏基址、礼村和齐村北出土带“周”字的部分陶器可确定属于先周晚期,而岸底、碾子坡两遗址所见陶文并非“周”字;西周金文的“周”地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周原遗址;礼村 H8 可作为探索更早期先周文化的新基准。褚柏红《莒文化研究》(《东方考古》第 6 集,科学出版社)通过考古遗存分析了莒文化发展、壮大的动态过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与土著习俗的相互作用。晏昌贵《西周陶簋所见筮数、图象考释》(《周易研究》第 2 期)通过考察陶簋筮数与图象的对应关系,认为图画所表现的就是筮数之“象”,由此可证《易·系辞下》“制器尚象”的观念早在西周晚期即已存在。谢尧亭《晋国早期人群来源和结构的考察》(《新果集》)据埋葬习俗推断,晋国早期墓地的死者分属不同族类,周人头向北,土著唐遗民头向东,头向西的则为殷遗民。胡雅丽《九连墩一、二号墓墓主关系厘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从位置关系、性别特征判定两墓墓主为夫妻关系。此外,还有黄尚明《西周龙凤人物玉雕的主题探讨》(《西部考古》第四辑)、梁云《晋都新田的年代和布局》(《俞集》)、朱继平《东周时期楚人开发鄂东地区的历史进程研究》、黄尚明《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均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等文。

1911 年以来学界对清儒《尚书》著述研究综述

史振卿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所 湖北武汉 430079)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学者不断对此注解。清儒为之注解的著述达 300 余部,涉及《尚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广、学术之精,为历代研究之精要。民国以来治《尚书》的学者承继清儒治学的途径,不断评介清儒尚书学成就,涌现出大量研究著述,现把 1911 年以来学界对清儒《尚书》著述研究略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是正。

一、通论性研究

较早对清代尚书学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的是古国顺,他从现行书目叙录、辑佚书目、未见书目三方面辑录清儒尚书学著述,重点是现行书目叙录部分,按训诂义解、通论及杂纂、辨证、考证、文字音义等属类梳理(《清代尚书著述考》,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1975年硕士论文;后发表在《女师专学报》1978年6月第10卷、1979年6月第11卷),又发表《清代尚书著述考序例》(《图书与图书馆》1977年4月第3卷),出版《清代尚书学》(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一书,从清儒对蔡氏《书集传》之研究、伪《古文尚书》之辩证、伪《古文尚书》之辨获、远溯东汉之古文尚书学、远溯西汉之今文尚书学、汉宋兼宗之尚书学、书序及其他单篇之研究、清代辑佚与校勘尚书之成绩等八个方面总结清代尚书学成就,是尚书学第一部断代史。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从《尚书》整理、发现、传授、真伪、存亡等方面考辨清儒的研究成果,对探研清代《尚书》辨伪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刘起釭《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专辟“清代尚书学研究”一章,分清初宋学余波的尚书学、完成疑辨推翻伪古文、迷恋伪古文的徒劳反抗、清代主力对今文尚书学的研究整理和一般尚书学著作、对《禹贡》和《洪范》等单篇研究、今文经学《尚书》研究、近代《尚书》研究等七节,探讨清代尚书学流传状况和学术渊源,是研究清代尚书学的力作。此外关于清代洪范学的研究有刘起釭《历代洪范学》(《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和张兵《清代〈洪范〉诠释研究》(《〈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等。

二、人物及其论著研究

王夫之与《尚书引义》。《尚书引义》是王夫之的哲学著作之一。林青山《从〈尚书引义〉看王夫之的认识论》(《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认为王夫之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知行关系、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关系来讨论其认识论价值。庄庭兰、刘晓东《论王夫之的〈尚书引义〉——思辨性的〈尚书〉学》(《黑河学刊》2007年6期)从天人关系、主客体关系、知行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中,指出王夫之思辨性的尚书学特征。张学智《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用实心实学来诠释王夫之《尚书引义》的学术价值。杨艳香《论王夫之的文质观——以〈尚书引义·毕命〉为例》(《船山学刊》2008年第2期)把象、形和文、质联系起来论证王夫之“气”论的文质观。

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对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颇多。容肇祖《阎若璩的考证学》(《岭南学报》第1卷4期,1930年9月;后收入《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由地理沿革、典礼制度等15例,总结阎若璩的考证方法。

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从阎若璩把以前粗疏的辨伪法精细化、集众家于一手、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准确熟练等三个方面分析阎若璩辨伪方法。此外,徐小蛮《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清籍琐议》,海洋出版社,1993年)、王

昭《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魏慈德《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东吴中文学报》1999年第5期)等从考证内容和方法论阐述阎若璩的学术成就。

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对余英时提出阎若璩学术考辨哲学动机和理学立场提出质疑,认为阎氏“虞廷十六字”考辨毫无哲学动机,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也表明考辨从义理主宰到客观考证的思想历程;他随后又发表《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之思想史及相关问题的再考察——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经学研究论丛》第4辑,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继续探讨阎若璩学术考辨的思想价值。陈居渊《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在清代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23辑《经学今诠续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认为阎若璩在考辨中,坚持理性判断和解析性选择的考证方法及反思性整合的原则,《尚书古文疏证》真正的价值不是反理学的思想,而是它具有尊汉抑宋的经学旨趣。

另外还有许华峰《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1994年)、吴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曹海东《〈尚书古文疏证〉时名称之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李燕《〈尚书古文疏证〉成书考略》(《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

阎、毛之争。阎、毛之争,为尚书学之公案。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史时,称阎若璩为“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尚书古文疏证》开创近代之辨伪学(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燕京学报》第5期,1929年6月)虽指出梁氏论据的不足且多有武断,但仍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书。

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3年)指出毛奇龄在辩解中有误据、臆说、强辩、曲解、游离、源矫、颠倒、矛盾八种错误,从而肯定阎若璩的功绩。随后引发学者的争议:王保德先后发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驳议》(台北《台北中华杂志》第7卷第9、12期,1969年9、12月)、《阎若璩妄证德乃降郁陶系伪窜》(台北《中华杂志》第6卷第1期,1970年9月)、《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驳议续论》(台北《中华杂志》第8卷第10期,1970年10月)、《评阎若璩证壁中书出景帝初的无据》(台北《中华杂志》第6卷第4期,1970年12月)、《阎若璩不了解同德度义的意义》(台北《学园》第6卷第7期,1971年3月),胡秋原发表《关于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公案》(台北《中华杂志》第7卷第9期,1969年9月),刘善哉发表《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道统的反考证》(台北《学园》第5卷第4期,1969年12月)、《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反考证》(台北《学园》第5卷第9期,1970年5月)、《阎若璩攻击大禹谟皋陶迈种德之评议》(台北《学园》第5卷第12期,1970年8月)、《阎若璩疏证攻击胤征的评议》(台北《学园》第6卷第3期,1970年11月)、《阎若璩以孔传尚书用七世庙为伪文的反考证》(台北《学园》第6卷第5期,1971年1月)进行反驳,以改变扬阎抑毛的风气。

近年来大陆学者重评阎毛之争,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总结阎氏八大错误,强调《古文尚书》不伪。张岩则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中利用计算机检索进行字频统计分析,从文献学、逻辑学、历法学等多学科全面反驳阎氏的《尚书古文疏证》,认为《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惠栋。赵铭丰《惠栋〈古文尚书考〉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从文献征引的学术价值、考辨方法、辨伪举证等方面考论惠栋《古文尚书考》价值,同时厘订此书与诸家《古文尚书》考辨著作在考辨方法的同异,与辨伪举证的重出关系,而后分析惠栋在清代《古文尚书》考辨史上的学术地位。李开指出惠栋从宏旨大义和条目奥旨,以求真《古文尚书》之义,校释语言文学以求文献之真本(《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应宪《惠栋尚书学》(《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比较惠栋与阎若璩的尚书学思想中,认为惠氏的尚书学是基于批判宋儒“十六字心传”而展开。

王鸣盛。施建雄在《王鸣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中以“经学领域的创获”为题,分二章专门讨论王鸣盛的尚书学贡献。指出王氏从《古文尚书》篇章之谬、经传以作伪踪迹、经传以所载内容、语言特色等辨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在明确真古文后,王氏打破今古文的藩篱,对商周的历史及三代的礼仪、制度作一番考辨,运用历史考据法促进经文考辨的新发展。

戴震。赵铭丰《戴震〈尚书学〉考辨方法述要》(《高雄师范大学2007年第三届青年经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论述了戴震尚书学考辨方法。李开强调戴震以词通道的尚书学贡献(《戴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郑吉雄《论戴东原经学中的文化意识》(单周尧主编《明清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认为戴震治经重在发明经典中的礼制,在此视角下评析《尚书义考》学术价值。此外还有王光汉《〈尚书义考〉整理本指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5期)。

焦循及焦廷琥。赖贵三《焦循〈尚书〉学及其研究述评》(台北《国文学报》第32期,2002年12月)在评述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焦循尚书学思想。陈居渊《论焦循的〈尚书〉学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强调焦循对伪孔传的解释优于汉代马融、郑玄等经师,其旨在维护伪《孔传》的经典地位,又提出《舜典》未亡,《大禹谟》、《皋陶谟》原为一篇的论断。蒋秋华《焦廷琥〈尚书伸孔篇〉初探》(《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99年)探讨焦廷琥《尚书伸孔篇》学术价值。

高邮王氏。单殿元《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后收入单殿元《王念孙王引之著述析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从高邮王氏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的文字考定,针对别人误解另立新说的经文新解,分析句式、以例求义、因声求义等方法来解释虚词等方面评价高邮王氏尚书学价值。此外还有许华峰《王引之〈尚书训诂〉的训诂方法》(收于《经学研究丛刊2·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

刘沅。蒋秋华《晚清四川学者的〈尚书〉研究》(《儒藏论坛》第二辑,2008年)、《刘沅〈书经恒解〉研究》(《经学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年)梳理晚清四川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后,指出刘沅在《书经恒解》中强调孔子未作《书序》,古文非尽伪,同时在注解《尚书》时,常引《老子》之语释之,也常以自己之见解作标准判定,故不为考据学者重视。后他又发表《刘沅〈书经恒解〉之义理观》(蔡方鹿主编《经学与中国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闿运。郑裕基《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改动“雅雨堂本”〈尚书大传〉举例》(台北《中华技术学院学报》34期,2006年6月)考述了王闿运的《尚书》学,并分析其学术价值。

皮锡瑞。曹辉《论皮锡瑞的〈尚书中候疏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皮锡瑞采众家之说对袁均的《尚书中候》正误,批伪孔传之谬,纠正郑玄的错误,考论名物制度,又有阙疑的态度等方面评述《尚书中候疏证》的学术价值。

此外,伦明在《续书楼读书记》(《燕京学报》第3期,1927年6月)中取毛奇龄以下为伪古文者辩护的十二部著述及《孔子家语疏证》作简明提要。蒋秋华以夏之芳《禹贡汇览》、孙乔年《禹贡释诂》、焦循《禹贡郑注释》、成孺《禹贡班义述》为重点,探讨清代扬州地区学者的《禹贡》研究成果(《清代扬州学者的禹贡研究》,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陈志明《〈日讲书经解义〉初探》在述论《日讲书经解义》内容后,指出此书是汉族官员把管理理念传授给君王的媒介(《明清学术研究》)。另外还有毛远明《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的文献价值》(《文献》2000年第2期)、闫宝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探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6期)、蒋秋华《吴汝纶〈尚书故〉主〈史记〉说平议》(《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大中文系,2006年)、孙玉敏《王先谦尚书学思想》(《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昊《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王应宪《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研究》(《清代吴派学术研究》),等等。

三、学术思想价值研究

在清代学术思想的视野下审视清儒的尚书学,是近几年学者着力的一个方向。王旭艳、庄大钧《论从理学到朴学转型期的清初〈尚书〉学》(《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认为清初尚书学从宗《蔡传》的尚书学,向驳《蔡传》及兼采汉宋的尚书学转变。吴通福围绕阎毛之争,认为双方考辨及其他学术活动体现思想上的反理学和学术上的重考证(《晚出〈古文尚书〉与清代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邱志诚《〈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把《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联系起来。而马延炜《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船山学刊》2008年第3期)认为晚清古文《尚书》辨伪并非学术意义,而是学人对世变的反应,是对救国的一种应对方案。

四、综述性研究

许钺辉在《六十年来之尚书学》(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指出1912至1971年尚书学研究的三个方面成果:疑《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并辨明其著作时代;运用地下史料,驳正《书序》之误说;运用甲骨彝器之史料,说解《尚书》,不囿于家法门户之见。蒋秋华《五十年来之尚书研究》(林庆彰主编《五十年来之经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3年)梳理1949至1998年台湾地区学者对清代尚书学的研究成果后,介绍戴君仁、屈万里、程元敏、许钺辉、李振兴、陈铁凡、戴琰璋、朱廷献等学者,同时分析近50年来台湾尚书学研究史关于“周公是否称王”、“古文尚书的考辨”两次论战。王连龙《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

期)重点讨论20年来《尚书》的综合性研究、注译、年代等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成果从客观上勾勒出清代尚书学研究的全貌,揭示出其研究特点和方法,对进一步探研清代尚书学大有裨益。总的来讲,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由于受到古史辨派的影响,民国以来学者大都在总结辨伪方法,从而肯定以阎若璩为代表的古文辨伪学派。二、台湾地区学者对清代尚书学的重大问题涉猎较多,有通论性的专著,也有个案研究的著述;大陆学者近十几年来重点是把尚书学放在清代学术史中考察,从中发掘其学术思想价值。同时也有不足之处:一、对清代尚书学的考察仍处在材料整理阶段,二百余部的著述所关注的问题有哪些,清儒怎样通过解读《尚书》来解决国家、社会、个人问题,等等,研究甚少。二、个案研究以清儒中辨伪学者居多,对伪古文辩护者和用于启蒙、科考的论著研究较少;另一方面个案研究重方法轻思想,对古文《尚书》辨伪的思想价值缺乏深入的分析。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主要学术观点综述

2010年6月12-14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承办的“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在重庆隆重开幕,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单位的先秦史学者1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清华简”的发现与整理》的大会学术报告,论述了清华大学藏的战国竹简的整理最新进展,这批珍贵文献在学术和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刘豫川研究员作了题为《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三峡地区最新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成果,阐述了三峡地区古文化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本次研讨会涉及先秦史与三峡古文化研究的诸多问题,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先秦史研究。对中国文明起源、先秦经典著作及人物、战国简等方面的讨论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形成了会议的一大热点。

在文明起源和三代历史研究方面,洛阳市文物管理局蔡运章在《大皞伏羲氏名号及其历史地位》中认为大皞、伏羲氏皆为“风”姓,都以“龙”为图腾标识,可见二者为一人是可信的,伏羲是其名,大皞则是其尊号。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田广林的《由祀到礼:东北古玉与礼制文明》认为,中国的国家制度直接植根于前国家时代以玉器为基本载体的神事祭祀体系,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玉文化和礼文化的民族特征。定型于三代之际的礼制传